

四十年來大陸捻軍史研究之簡介及省思

陳 華

池子華

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所 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

1853至1868，即清咸豐三年至同治七年的十五年間，捻軍豎旗抗清，兵鋒波及皖、豫、魯、蘇、直、晉、鄂、陝、甘、川十省，為十九世紀中，僅次於太平天國的巨大內亂，但史學界對捻軍的專門研究起步甚晚，1934年由南京中央大學排印郭廷以編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有相當多的篇幅記載捻軍事蹟，認定了捻軍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但此書尚非研究專著。1939年羅爾綱寫的《捻軍的運動戰》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可稱之為捻軍研究的開端。捻軍歷史真正受到重視而有眾多學者投入研究，是從五〇年代以後開始的。1953年中國史學會編輯的《捻軍》資料六冊由北京神州國光社出版，隨後又有多種文獻資料出刊問世，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四十年來，海內、外關於捻軍史的研究論著已告不少，其中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數量上佔了絕大比例。他們有許多曾共同經歷了研究「農民戰爭」的熱潮，及文革時「四人幫」的逆流等等；而這些都牽引到歷史研究觀點及研究環境的變易，但其重視階級鬥爭的立場則大抵不變。在此情況下，捻軍的性質及領導人物的評價就成為討論焦點。這固然使捻軍史的研究受到局限，但在論辯中也釐清了不

少重要的問題。本文乃嚐試對過去四十年來大陸學者的捻軍研究，作一綜合性的回顧與討論，以下先介紹有關資料的搜集、整理及出版情形，然後再就其研究成果作分類討論。

一、資料部分

(一)清代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

1951年開始，由范文瀾、翦伯贊等主持，費時兩年編成《捻軍》六冊（前揭）。這是一部捻軍資料專輯，約二百萬字，收錄清代官方文獻、地方志資料及私人著述，是捻軍研究的最基本參考資料。但這部書中並不收輯〈詔諭〉、〈奏議〉、〈傳記〉等項，學者須自《欽定剿平捻匪方略》、《清史列傳》、及曾、左、李等文集中搜尋。1957年江世榮編輯的《捻軍史料叢刊》共三集，約五十萬字，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次年，聶崇岐搜集的《捻軍資料別集》，約廿二萬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二書也是研究捻軍史的必讀之物。至於此後零星發現的有關捻軍史料，多分散發表在報刊及其他資料文集，則不一一介紹。

(二)實地調查訪問的口碑資料

淮北地區在五〇及六〇年代仍可尋訪到當年捻軍的孫輩及曾孫輩後人。其所口述的捻軍人物的佚聞佚事，其真確度有些須作保留，但由於清代留下的文字資料幾乎全為官方或士紳地主的記載，也就是說這些記述都是出於剿捻或抗捻者之手，相對之下，在捻軍起源地區對捻軍後人所作的口述歷史，遂有足資對照參考之處。

1958年，安徽科學分院歷史研究室組成捻軍調查組，到皖北

渦陽、蒙城、亳縣、濉溪以及河南永城等地進行考察，搜集大量有關捻軍的口碑資料，編成〈捻軍調查資料稿〉，但未刊行。而其他學者所作的調查報告，已經發表的列舉如下：〈張樂行故里訪問瑣記〉（葛召堂，《史學工作通訊》，合肥，1957年第2期）、〈捻軍革命活動史實採訪實錄〉（王奎璧，同上第3期）、〈東捻軍失敗與賴文光被俘事跡調查簡記〉（祁龍威，《光明日報》1958年2月3日）、〈雉河集調查記〉（江地，《山西師範學院學報》，太原，1959年第4集）、〈蒙城地區捻軍起義調查報告〉（張畏三，《光明日報》1961年4月12日）、〈陸遐齡起義調查記〉（吳騰鳳，《近代史資料》，北京，1981年第3期）、〈張宗禹下落調查記〉（張珊，南京大學太平天國史研究室編《太平天國史新探》，南京，1982）、〈捻軍調查記〉（馬昌華，《安徽史學》，合肥，1984年第1期）、〈捻軍紅筆師爺張露蘭史跡採訪集〉（池子華，《誌苑》，合肥，1990年第1期）等。這些調查報告中也收錄了一些文字資料（如手抄本、未刊稿等）、一些實物照片（如碑記、墳墓、武器等）。但最主要的還是口頭調查資料，這提供了研究捻軍史的另一面參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對流傳在淮北等地區的捻軍歌謠及故事的搜集與整理工作。五〇年代後期大陸興起搜集新民歌運動，對於流傳在淮北等地的捻軍歌謠，史學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都有很大的興趣。在1958年至1960年間，許多團體與個人紛紛深入鄉間搜集歌謠，足跡從皖省遠至豫、魯、晉、蘇等地。196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李東山等搜集的《捻軍歌謠》，次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刊行由阜陽專區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輯的《捻軍歌謠》，二書中所集歌謠扣除重複者約有三百餘首。搜集歌謠的工作持續進行到1963年，其間在報刊發表的亦為數不少。收集到的歌謠有缺字漏句或有不通處，有些工作者可能擅自補字或修改，亦有

熱衷者可能揣摩自創，因此作為史料來看，其中問題重重。例如1962年8月23日《安徽日報》刊出〈新發現的擒軍歌謠十二首〉（安徽合肥師範學院歷史系擒軍調查組寫）就引發學者質疑。次年十一月十五日同刊出吳騰鳳的辨偽文章，指出這批歌謠最大的破綻是出現五處「擒軍」，蓋「擒軍」一詞首見於羅爾綱《擒軍的運動戰》一書，有清一代並不見此稱呼。同樣的，在擒軍歌謠中如出現「象太陽」、「翻身」、「志氣高」等1949年後的常用語，也都可疑。一般而論，若同一時期的調查，在多個地區都收集到同一首歌謠，則可信度較高。至於要從歌謠的風格、用詞、題材等各方面來鑑別真偽，則視各人功力。而最大遺憾是當初在搜集歌謠時，並未記下曲譜，而今想要追補已是不可能了。

在搜集擒軍歌謠的同時，文藝工作者也對流傳的擒軍傳說與故事進行採掘。經過整理發表的故事有三百多篇，後來再從中精選出《擒軍故事集》一書，197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由於從採訪到寫作已是一種文學上的表現方式，或者可說是某種民間文學的再現與修飾。因此，《擒軍故事集》要作為史料來應用就更為困難。

擒軍歌謠與故事的搜集編纂所以蔚為熱潮，原因之一是相信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歌謠與傳記故事，最能真實而生動地反映擒軍運動的本質和面貌（見李東山《擒軍歌謠》，〈編者的話〉）。在收集的歌謠中，大部分即是以窮人造反、農民起義為主題，其中又有多首係描述咸豐年荒歉，官逼民反的慘狀。如〈等死不如起來反〉這首歌謠中所述：

「咸豐年、大歉年，渦河兩邊草吃完，地下錢糧逼著要，
等死不如起來反。」（李東山，《擒軍歌謠》）

但收集歌謠及故事最熱烈的1958～60年的三年間，也正是大陸的艱困三年期間，淮北地區也鬧糧荒。當工作者正熱心地要從歌謠中呈現當年擒軍農民起義的面貌時，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他們是在影射現況。及至文革四人幫時期，擒首張樂行被指控「出身地主階級」、「兩次降清」，於是為張樂行著書立論的是為反面人物講話，而先前收集歌謠的工作者，有一些亦被指控「煽惑農民造反——反中央」，而遭到迫害，此為始料所不及者。

民國初年安徽督軍柏文蔚曾搜集有關張樂行的事蹟材料，這可能是站在反滿的意義上予以肯定，但之後並不見政府與學者有計劃地搜尋或調查擒的遺物及事蹟。因此五〇及六〇年代許多團體及學者個人到擒的故居及活動地區展開廣泛的調查是極有意義的。這些實地調查的資料雖然有前述的一些疑慮。但仍然是研究擒軍所必要參考的。

二、研究成果部分

初步統計，四十年來大陸學者發表有關擒軍的論文約有一百五十餘篇（包括在期刊上發表及專書或文集中收錄的），而在數十位作者中，應特別一提的是已故的擒史專家江地。他著作最豐，對擒史的討論在深度及廣度上亦最卓越。其主要作品見之於已出版的五本書中，1956、1959年，所著《擒軍史初探》及《初期擒軍史論叢》先後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81年，兩書增補合併而為《擒軍史論叢》，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再版。這可稱是一部以論文形式寫成的擒軍史，從縱的方面論述了擒軍的發生、發展和覆滅的過程。1986年齊魯書社出版了他的《擒軍史研究與調查》論文集，該書則從橫的方面探討擒軍的作戰方法、性質剖析、歷史分期、史跡

調查、資料搜集等問題。此外，在六十年代之初即已完稿但因故未能付梓的《捻軍人物傳》，於1990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書中分列〈捻軍領袖〉、〈地方農民軍領袖〉、〈攻捻清將〉等傳記，除敘述其事蹟行止外，並綜合探討各類人物的特徵。此書曾由日本學者並木賴壽譯成日文出版。江地的這些論著可綜合成一部捻軍史，但基本上仍由單篇論文所組成。以下便併入其他學者的論文來共同討論。

就所見及的一百五十餘篇論文而言，除了一些是專門對史實史料的考訂、敘述之外，大抵環繞著幾個主要的問題討論，如捻的性質、捻的正名、捻軍領袖人物的評價、與太平軍等友軍的關係等項。四十年來從這些爭議性的問題上，也可以較清晰地看出捻軍史研究的概況及成果，因此下文便以問題為綱來作分類介紹。

（一）捻軍鬥爭的性質

這是捻軍史研究中不可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大陸史學界比較普遍地將其視為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反抗清朝的起義。1979年傅衣凌在其〈明清時代階級關係的新探索〉（《中國史研究》，北京，1979年第4期），及〈關於捻變的新解釋〉（原寫於1944年，重登在《抖擻》，香港，1986年7月號）的兩篇文章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捻軍與太平天國是代表著兩個不同類型的社會勢力，太平天國為南方農民的革命運動，而捻軍則是北方在地方上有勢力者（地主與豪族）對抗中央政府（專制的封建清朝）的反抗運動。他的主要論點是，捻之興起，是由於蘇、皖、魯、豫四省邊區地瘠民貧的特殊地理環境所造成，一般貧民困於生活，結捻結幅，但捻軍的領導者卻多是地方上的強宗大姓或士紳階層中人物，與封建地

主階級有相當的勾結。他們本來都是維護中國專制的封建社會的基本力量，但清朝封建制在十九世紀的解體，中央統治力的鬆懈，引起他們的輕視與離心，進而割據一方對抗中央，捻軍運動由是擴大。在大土地所有制的擴展中，產生圩寨；而當時所謂的捻首、捻頭，同時也就是寨長、圩主、族長。他們領導親族、戚黨及其所屬圩寨中的貧困農民，其中也雜有不少流氓無產者。圩寨力量的過度膨脹，乃演化成捻變。

傅衣凌先後在1979及1980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引起不少反響，其中可以郭豫明〈捻軍鬥爭性質問題的探討〉（《太平天國學刊》，北京，第4輯）及江地〈關於捻軍史的幾個問題〉（《捻軍史研究與調查》，前揭）兩文為代表。他們都不同意傅文中的觀點，而認為捻軍的鬥爭一開始就是貧苦農民群眾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反抗活動。捻軍由於戰鬥和保衛農村群眾生命財產的需要修築圩寨作為據點，同清兵相對抗。傅衣凌上述的說法顯然把捻圩和官圩以及處於中間狀態的民圩混為一談。捻軍的領導人物除張樂行、張宗禹等少數外，絕大多數出身貧苦，他們提出來的主張也是代表勞苦群眾的切身利益。捻軍的鬥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相比，雖然是存在較多的弱點，但就其主流和本質而言，仍然是一次農民起義，而不是地方割據勢力對清朝中央的反抗運動。這個問題的論辯，仍然是以主張「農民起義」的一方佔優勢。但若要對捻的性質作較精確而非概括性的界定，顯然必須對捻軍成分及當地社會狀況作更精細的分析。

（二）正名問題

這個問題涉到「捻」的原義、捻的性質以及捻與太平軍的關

係等方面。「捻軍」之稱，始出自羅爾綱的《捻軍的運動戰》一書，由此沿用下來。但到1952年，羅爾綱在與列寧格勒大學教授葉菲莫夫談太平天國史問題時提出捻軍正名問題（見《太平天國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版），接著把《捻軍的運動戰》易名為《太平天國新軍的運動戰》，主張取消「捻軍」稱號，代之以「太平天國新軍」¹。1957年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再版〈緒論〉中對此問題又加以申論。1980年在《安徽史學》創刊號上發表題為〈捻軍正名——一個有關立場問題的名稱的商榷〉的文章，進一步發揮了他的觀點，根據滿清治捻律例和地主階級稱之為「捻子」的記載看來，他認為「捻」的名稱顯係污蔑，因此「捻軍」番號理應取消；主張不同階段對它提出不同稱謂：1855年張樂行稱「大漢明命王」以前可稱為「捻」，以後應稱「大漢起義軍」；1857年加入太平天國後應稱為「太平天國張樂行部」等；1863年經賴文光整編後應稱為「太平天國新軍」或「太平天國梁王張宗禹部」等。王慶成在1961年9月號的《學術月刊》（上海）上發表〈捻軍正名質疑〉一文，則認為捻是自稱，捻軍的名稱可以繼續存在，不應從捻軍奉太平天國正朔、遵照太平天國衣冠制度等形式上來否認捻自身發展的規律。馬昌華〈捻軍起義前的活動〉（《關於捻軍的幾個問題》，安徽科學分院歷史研究室編，1960安徽人民出版社）、江地〈論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關係〉（《捻軍史論叢》，前揭），張珊〈「捻」的名稱由來及其特點〉（《太平天國學刊》第4輯）亦作如是觀。郭豫明《捻軍起義》（1979，上海人民出版社）書中則把1864年賴文光部西北太平軍與捻軍合併後稱為「新捻軍」。這方面討論的結果，仍回歸到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關係問題上。

與捻軍正名相關的「捻黨」這一提法是否恰當的問題，也曾

有過爭議。馬昌華在〈捻軍起義前的活動〉（前揭）文中認為，從捻軍的整個歷史來看，找不出它有結黨結社的活動。而在資料裡所見到的「捻黨」這一字眼，不過是「成群結黨」的意思而已，此處之「黨」與「夥」同義。如果今天還沿用捻黨這一稱謂，是沒有甚麼必要的了，且易使人產生誤解。李東山〈試論「捻」和白蓮教的關係〉（《江淮論壇》，合肥，1980年第6期）則認為「捻黨」之說應該糾正，理由有兩點：第一，「黨」字在中國古代含有貶義，而「捻」的原義即有團聚、組織的含意，在「捻」字後無加「黨」的必要。第二，「革命黨、政黨」都有明確的黨章、黨綱和黨的具體領袖，而當時的捻卻不具備。因此，「捻黨」應正名為「初期捻組織集團」或「初期捻自由組織」。成軍之後，可稱「捻」義軍。江地〈論捻黨〉（《捻軍史論叢》，前揭）認為，「捻」或「捻子」是長期不變的傳統稱號，因此，把這一組織稱之為「捻」，把它的歷史稱為《捻史》，把它的反清結社時期稱為「捻黨」，把它的抗清起義時期稱為「捻軍」，既概符合歷史實際、也符合群眾傳統的，不必加以改變。

在「正名」問題的討論中，反映了學者對捻的意義及捻的發展史的基本看法，有所分歧也是自然的了。

（三）捻軍與太平天國的關係

這是大陸捻史研究學者中爭論時間最久、最為激烈的問題。主要有以下種觀點：（1）羅爾綱認為，所謂「捻軍」本是淮河流域的地方起義組織，他們在1856年接受太平天國的封號，打著太平天國的旗幟時，「聽封而不聽調」，還保存著地方隊伍的色彩，但天京陷落後，經過賴文光用太平天國兵制把他們重新組織、

訓練起來，乃成爲一支完完全全的太平天國新軍（《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北京，1957），基本上，羅爾綱認爲捻軍不是一支獨立的起義武裝，而是太平天國的附庸、太平軍的一支。(2) 江地認爲，太平天國和捻軍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在不同時期裡，有著不同的關係：1797～1853年爲捻黨時期，天各一方，兩者毫無瓜葛；1853～1857年是互爲影響時期；1857～1861年是聯合作戰時期；1861～1864年是若斷若續時期；1864～1868年是合併作戰，以太平天國爲領導，以捻軍戰爭爲主體的時期。（〈論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關係〉《歷史研究》，北京，1963年第3期）。(3) 史式認爲太平天國是個聯合體，是當時許多農民起義軍的共同旗幟，它和捻軍之間的關係是聯合體與其所屬的一個實體的關係。作爲主要實體的太平軍，與捻軍之間的關係是友軍關係。太平天國、太平軍二者之間不能劃等號（〈太平天國與捻軍及其他友軍的關係〉，《學術月刊》，上海，1987年10月號）。(4) 盛巽昌、池子華認爲，捻軍並未歸併於太平天國，更沒有成爲「太平天國新軍」。相反地，太平天國對捻軍是利用、歧視、排擠，捻軍對待太平天國亦如是。強敵當前，他們「急則相倚」，實現聯合；富貴難同享又使他們互相排斥。他們的關係可分三個時期：1853年2月～1857年3月，捻軍獨樹一幟，「不屑附於長髮」時期，1857年3月～1864年11月，爲各自的目的而暫時合作時期；1864年11月～1868年8月，太平軍殘部併入捻軍，打著捻軍的旗號繼續抗清時期。（〈對捻軍與太平天國關係問題的新探索〉，《江海學刊》，南京，1988年第4期；〈共患難易，同富貴難——從官爵上透視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成都，1988年第6期）。

(四)分期問題

1956年7月5日，江地在《光明日報》發表〈關於捻軍史分期問題〉的文章，引起討論。究竟應以什麼標準來分期？分作幾期？多年來許多學者因所持標準不同，而發表了不同的分期法。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類：(1)強調太平天國的主體性，把捻軍戰爭作為太平天國的一部分看待。依此標準來作捻軍史分期的如祁龍威〈關於捻軍史分期問題的商榷〉（《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及羅爾綱〈捻軍正名〉（前揭）等。(2)既強調捻軍本身發展的規律性，也考慮太平天國的影響，依此標準作分期的有江地〈論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關係〉（前揭）及羅文博〈捻軍史的分期問題〉（《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2期）等。(3)將捻軍史作為一個獨立的農民革命史來看待，其何時公開反清，何時有政權要求，便成為最重要的分期點，但也並不否認太平天國是鬥爭主力，而捻是作為其助力的事實。以此作分期標準的如郭因〈我對捻史分期問題的意見〉（《史學工作通訊》，1957年第3期）。

由於標準的不同，在劃分點和分期的期數方面就出現差異，而這問題依然是繫於捻與太平天國的關係的討論上。

（五）捻與白蓮教的關係

這問題牽涉到捻的基本性質。在捻史研究中，也是爭議性較大的問題。江地在〈論捻黨〉（前揭）一文中認為，捻黨是白蓮教的變種，和白蓮教有密切的歷史淵源。他的理由是：(1)捻黨產生以後，捻黨成員和白蓮教徒一同組織過抗清起義。捻軍起義以後，曾借用白蓮教的旗幟、稱號、方法和鬥爭經驗，有的捻軍領袖兼有白蓮教教主的雙重身份。(2)捻黨的故鄉就是白蓮教的故鄉，有著歷史淵源關係。(3)捻軍雒河集會盟時，建國號為「大漢」，張樂行稱「大漢明命王」。「大漢」即是白蓮教長期進行

反異族侵略的思想在捻軍及其領袖方面的反映；「明命王」與「明王」、「小明王」、「漢明皇帝」的稱號如出一轍，說明捻黨借用了白蓮教教義和鬥爭綱領。馬昌華認為，捻和白蓮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組織，看不出歷史淵源來；捻軍的旗是五色旗和五色鑲邊旗，未曾借用白蓮教的旗幟；捻軍不是宗教組織，談不到從白蓮教那兒借用教義。他的結論是，捻黨不但不是白蓮教的變種，而且兩者之間時常發生磨擦。（〈捻軍起義前的活動〉，前揭；〈再論「捻」與白蓮教的關係〉，《江淮論壇》1981年第6期）。李東山認為上述兩種說法都有些偏激，他認為捻既不是白蓮教的變種，也不是白蓮教的仇敵；捻和白蓮教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其立論根據與第一種說法大致相同，（〈試論「捻」和白蓮教的關係〉，《江淮論壇》1980年第6期）。

大致上多數學者不認為白蓮教與捻有密切關係，或對捻有嚴重影響，但亦不排除二者間的歷史淵源，以及抗清起事時，在同一地區中的相互滲透影響。

（六）捻回關係

1866年10月東、西捻分軍後，張宗禹率西捻軍前往陝甘與回民軍聯合抗清。兩軍關係如何，史學界有不同認識。江地〈論西捻軍抗清鬥爭〉（〈捻軍史論叢〉，前揭）認為兩軍在同一個地區裡流動著，他們的關係為各行其是互不侵犯；有時在清軍強大壓力下曾作戰略上的配合，但這種壓力一旦減輕，便彼此分道揚鑣，甚至曾經兵戎相見。陸芳〈西捻軍抗清鬥爭及其與西北回軍的關係〉（《安徽史學通訊》，合肥，1958年第2期）認為江地所述與事實不符，兩軍不僅有戰略上的配合，而且有聯合作戰，共同保衛綏德的事實；兩軍分道揚鑣不是由於清軍壓力減輕而是相反；結果西捻軍雖然沒能完成入陝鬥爭計劃，但經多次努力，終於吸收一部分回民軍加

入西捻軍隊伍。曾立人〈西捻軍和西北回民軍聯合抗清的一些問題〉（《西北大學學報》，西安，1978年第4期）又與上述兩說不盡相同，認為兩軍雖有過軍事聯合，但沒有達到政治上的聯盟，因而聯合是不鞏固的；分道揚鑣是由於兩軍性質和政治目標不同、戰略戰術不同、民族和宗教的隔閡以及清統治者的分化離間政策等引起，至於清軍壓力的大小並不起多大的作用。

這方面的討論，是建立在西捻軍與回軍的活動事蹟上。因此若能對當時陝甘地區的情況作更深入、詳細的探討，當有助於捻回關係的釐清。

（七）張樂行的功過是非

文革時李秀成的評價問題曾在太平天國研究圈中，掀起驚濤駭浪，多名學者因而遭到批鬥。張樂行是捻軍中最重要的領袖，論定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會影響到撰寫捻軍史的方向，而此評價若牽連及政治運動，對研究捻軍的學者來說，其衝擊便不止於學術層面而已。所幸此問題的爭辯，已歸趨到對史實的討論，如張樂行兩次受撫的前後實際情況，及與陸遐齡事件的關係等的探討。以下選擇幾篇較具代表性的文章，顯示多年來史學界對張樂行不同評價的看法。

第一種是認為張樂行是傑出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領袖。他從1853年開始領導皖豫農民抗清，最後犧牲生命。在鬥爭中主張各支捻軍聯合，主張同太平軍聯合作戰，並擊敗和牽制了衆多清軍，對太平天國後期鬥爭的新發展有一定的貢獻。（見沈心康〈張樂行與捻軍〉、《安徽日報》1963年3月30日；張珊《張樂行的革命精神永在》、《江淮學刊》，合肥，1963年第5期）。

第二種說法是認為張樂行不是一個堅持革命、堅持鬥爭的英

雄。他幾次受撫，曾參與鎮壓陸遐齡起義，是一個爲了做官出賣農民利益的叛徒，（見高鴻志〈張樂行是不是英雄〉、《江淮學刊》1964年第6期）。

第三種意見是主張對張樂行的功過作具體分析。郭豫明在〈試論張樂行〉（《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期）文中認爲，張樂行在擔任盟主之前，有過反覆，之後在鬥爭過程中逐步趨向革命。自從他當上盟主以後，雖仍有缺點，可是他堅持與太平軍聯合抗清，是應予肯定的，郭文是由張樂行在當上盟主後的主要鬥爭過程中來給予肯定。但張樂行是否接受過清政府的招撫，是否參與鎮壓陸遐齡農民起義，仍然是張樂行評價問題上存在分歧的一個焦點。對此問題，有些研究者進行了專門的考察，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鄭兆璽〈張樂行受招撫與打陸遐齡質疑〉、（《阜陽師範學院學報》，阜陽，1983第1期）；趙保佑〈張樂行受招撫與打陸遐齡考辨——兼與鄭兆璽同志商榷〉、（《江淮論壇》1984年第1期），都提出了有利於張樂行的證據。也有學者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跟爾後捻軍的發展，認爲張樂行的受撫是一種「策略」。羅爾綱的〈張洛行傳〉（《安徽史學》，1984年第3期）便持此看法。

（八）「劉餓狼事變」的問題

1857年12月，張樂行領導各路捻軍在淮南六安與太平軍聯合作戰時，藍旗旗主劉永敬（綽號餓狼）主張撤軍北返，經紅旗旗主龔德樹設計，張樂行默許，將劉永敬及其侄劉天臺（綽號「小白龍」）以反叛的罪名予以誘殺，這便是捻軍歷史上的「劉餓狼事變」。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對捻軍與太平天國關係的認識，更關連到張樂行、龔德樹、劉餓狼等捻軍領袖的評價問題，在捻史研究的學者中也產生一些分歧的意見。

羅爾綱在〈張洛行傳〉（前揭）文中認為劉永敬早有異志，想稱帝稱王，自立新朝，他引一首民謠：「順河集，霧騰騰、餓狼賽朝廷，全勝守闕龍，東宮娘娘蔡小姐，西宮娘娘戴秀英」，認為這充分反映了劉永敬的帝王思想。張、龔若不及時遏止，將危害整個捻軍的抗清運動。江地在〈淮南時期的捻軍戰爭〉（《捻軍史論叢》前揭）文中指出，劉部欲北歸，張、龔不允，這是屬於破壞軍紀與維護軍紀之爭，並不是劉有「異志」，即並非革命者與叛徒的鬥爭。江地在另一篇文章〈論淮河流域的捻軍戰爭〉（《捻軍史論叢》，前揭），較深入的分析捻軍內部的兩種不同政治主張，即主張赴淮南與太平軍合作的聯合派，及寧願留在淮北、單獨抗清的分裂派。江地認為張、龔的聯合派的政策是正確的，分裂派反映了農民的地方觀念，以及流民成分的不慣於軍紀約束的特性，破壞了捻軍的統一與指導。

池子華在〈評劉餓狼事變〉（《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3期）文中對上述說法，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不能以是否有〈帝王思想〉來作臧否論斷的依據。順河集起義後，劉產生了帝王思想，這是事實，但與劉同時的張樂行、張茂、武大僧等，也都以帝王自居，其間豈有輟輟可言。而所謂聯合派、分裂派之劃分缺乏根據，實際上劉與張、龔的政治主張不僅沒有分歧，而且是一致的。捻軍南下的最終目的是為北向，「會兵北剿，共建基業」是捻軍整個淮南戰爭的指導原則或戰略方針。對此既定方針，劉曾以行動表示支持。同時，「劉餓狼事變」發生在捻軍與太平軍聯合作戰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促使他們發生重大歧見而導致事變的主要因素是當時南北戰爭形勢的改變，次要的因素則是捻軍領導集團內部矛盾的積累。當時在淮南的太平軍為解鎮江之圍，大部分奉令東調，淮南並無多少戰事，而淮北烽火連天，新崛起的苗沛霖

傾力進攻捻圩，因此，劉永敬主張回軍淮北，維護根據地，張、龔則無動於衷，雙方堅持己見之下，兼之積隙不釋，張、龔乃定計殺劉。從戰略的觀點看，劉的主張是有道理的，從淮南戰爭的結果來看，張、龔對形勢及自己軍力的評估是有問題的，而殺死劉永敬後，造成藍旗捻衆大批潛返淮北，以及捻軍內部分裂的加劇的後果來看，張、龔之舉是不智的。

除上列八項較富爭議性的問題外，如「雉河集會盟的意義」、「張宗禹下落的考證」等問題，也都有多篇文章討論，因篇幅所限，不一一介紹。此外，尚有許多值得參考的單篇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捻史，如祁龍威〈外國侵略者對捻黨起義武裝干涉〉（《光明日報》1955年10月13日），趙豐田〈安徽捻軍在河南戰場上的重大成就和意義〉（《中國科學院河南分院歷史研究所集刊》，鄭州，1960年第2期），張珊〈捻軍的組織〉、〈捻軍的戰術〉（《關於捻軍的幾個問題》安徽科學分院編，196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韓學儒〈捻軍的活動對太平天國有利還是有害〉（《江淮學刊》1963年第2期），池子華《試論捻軍旗制——兼與羅爾綱先生商榷》（《安徽師大學報》，蕪湖，1985年第2期），拓荒〈西捻東渡晉冀之因辨析〉（《安徽史學》1985年第5期）等，分別顯示捻軍史研究的多個側面。

結 論

江地在〈關於捻軍史研究工作的回憶〉中寫了這麼一段話：「把歷史事實串聯起來，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要進行理論分析，要對此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加以論斷和評述，這是要和原始資料的勾稽與編排同時進行的，這就是理論與專業的結合，在史學界叫做『以論帶史』或『論從史出』。」回顧過去四十年來大陸史學界對於捻軍史的研究，主要是以階級

鬥爭的觀點將捻軍史置入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中，於是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的論辯與評價自不可避免。但在有關史料尚未完全搜集刊行，一些基本史實尚未作較細部的更精確的考訂之前，過早的「以論帶史」所形成的熱烈論辯，有時恐怕反而影響了正常學術研究的進度。不過，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往返討論中，也確曾訂正或釐清了一些史事與觀念。因此本文所介紹的捻軍史中八項最具爭議性的問題的研究，內中論文也都相當程度地呈現出對捻軍史研究的貢獻。

若以時間為座標來回顧過去大陸學界捻史研究的論著，則文革十年（1966～76）仍是一重要的「變動時期」。之前，在農民戰爭的觀點下，將問題單純化，將人物美化、英雄化。數以百萬計的捻衆與數以百計的有名捻首，在反地主、反封建王朝的鬥爭大旗中，面貌雷同。而整個捻軍史的意義便是歸併入以太平天國的革命主流中。文革期間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下，革命的熱情似乎更為高漲。但問題是在極左派對革命的高度理想下，對歷史人物也就有高標準的重新審閱與批判，而這批判與文革時期的政治運動連結時，便偏離學術的論辯而造成政治迫害。在太平天國研究領域中，李秀成被嚴重否定，株連所及，許多過去被譽為英雄的農民領袖被戴上各種帽子，中國農戰爭史驟然失色，而歷史人物評價似也成了禁區。在捻軍研究領域中，最主要的捻首張樂行便成為批判對象，不僅一些歷史學者受到波及，一些文藝工作者及領導幹部也遭到打擊。「說什麼研究捻軍歷史，就是為叛徒張樂行樹碑立傳，說什麼編寫捻軍故事和歌謠，就是反動透頂……，有些同志連捻軍起義的歷史也不敢講了。」（見江地〈關於捻軍史的幾個問題〉，《捻軍史研究與調查》）。

文革後，許多學者從務實的史事分析與討論來重整捻史研究

，所採取的觀點也較廣闊。如對張樂行的討論，並不諱言其幾度降清的事跡，而能從早期反覆走上堅定的抗清發展過程來論述。對整個捻史的分期，也能凸顯出各階段的特徵及意義。乃至於捻軍鬥爭的基本性質，也可以有極不同的解釋來進行論辯，尤其有意義的是，對參與捻軍的一般農民，及土豪、游民或流氓等，也分別予以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討。相信許多新的問題和見解，可由此產生。可以說，在文革後，捻史的研究有了相當的進展。不過，仍然有相當多的領域尚待開發。經大略估計，在已發表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談軍事活動，人物事蹟的多，而談相關的經濟、社會以及思想方面的少；談捻軍主流（張樂行、龔德樹所部及後來的東、西捻軍）的多，而分區談地方捻軍的少。以大陸目前已搜集出版的豐富史料及充沛的研究學者群，應可再作一些專題及區域性的研究，如針對皖、豫、魯、蘇、鄂等各處捻軍區域的地理因素、土地問題、經濟情況、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及農民意識等，進行深入研究，當有助於瞭解捻軍的性質與全貌。而華北農民的抗清活動為何與起自兩廣的太平天國有許多不同之處？也許可以從中尋得答案。在這方面的努力，例如太平天國史專家方之光最近主張的以「中國農民學」作為研究歷史上農民問題的基礎，便是一個很好的嚐試。（見方之光，池子華〈中國農民學：歷史和現實的呼喚〉，《江海學刊》1993年第1期）。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雖然大陸有衆多學者投入捻軍史研究，也發表不少論文。但四十年來，並未有一場正規的捻軍史學術研討會，也尚未有一部有系統的「捻軍全史」專著。若要總結大陸學界以往的研究成果，並與其他地區學者交換意見，是很值得召開一次捻軍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對於捻軍史更進一步分工合作的研究，以及未來「捻軍全史」的撰述工作，會大有裨益。